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2.003

毛泽东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思想探析

李佑新, 霍杰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注重党的基层组织纪律建设,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系统理论:统一党员标准,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基本保证;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将“四个服从”作为实现党团结统一的“最重要的纪律”;在党内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纠正各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使铁的纪律逐渐转化为党员的自觉遵循。深入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思想,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2-0020-0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纪律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系统梳理毛泽东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对新时代促进党的纪律建设,特别是对我们解决基层党组织纪律观念淡漠、组织涣散和领导弱化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统一党员标准,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基本保证

党员标准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严格规定了入盟必须“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②等基本条件。列宁在创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时也十分重视党员标准,他指出,“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需要有觉悟的、决心作自我牺牲的人”^③,“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④。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毛泽东、蔡和森等党的创始人就注意到了党员标准问题。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细列出了布尔什维克党改为共产党之后的入党条件,并指出“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巨大的改造事业”^⑤。也正是在这封信中,蔡和森强调创建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一步就是“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⑥。毛泽东回信:“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⑦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毛泽东主张吸收团员应采取积极而慎重的

收稿日期:2024-12-22

作者简介:李佑新(1957—),男,湖南新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4页。

③《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

④《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⑤《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⑦《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78页。

态度,强调“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①。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注意团员的质量标准,所以湖南团的组织没有出现因成员复杂、信仰不一而发生波折的问题。

“注意找真同志”,实际上就是要求严格把握好入党标准,这是毛泽东关于党员队伍建设和加强纪律建设的一贯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四军内党的组织问题“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②。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③等五项标准作为新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必备条件,要求对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④。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⑤作为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毛泽东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吸收新党员主要是看他为实现党的主张所秉持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看他的出身和社会成分。此外,毛泽东还严格规定了入党程序。这些要求提高了入党的门槛,体现了党的组织纪律更加严格,为维护党的组织纪律提供了重要保证。

严格党员标准,不仅体现在发展新党员上,还表现在能够及时清除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党内不免会混入投机分子,他们立场不坚定,白色恐怖一来,这些人就纷纷叛党,带领反动分子抓捕我们的同志。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⑦。一方面,要严防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另一方面,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坚决清除混在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数量由 1937 年的几万人发展到 1947 年的 270 万人^⑧。但是,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把关不严,致使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乘机混入党内,“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整党的重大决策,坚决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思想划清界限。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要求“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⑩。在毛泽东的安排下,1951 至 1954 年进行了整党及“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进行了严肃查处,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变质分子共计 23.8 万人被清除出党,9 万余人不够条件自愿或被劝告退党^⑪。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农民成分的党员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村广泛存在的农民意识也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的建设中,“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⑫，“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⑬，“支部本身无日常生活,无计划去领导群众斗争,以致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教

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8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8 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 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 页。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0—621 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1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 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52 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53 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 页。

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2 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 页。

⑬《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 页。

育工作做得很少,党员政治水平很低,同志活动能力差”^①。党的基层建设中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也直接导致了党组织松懈、纪律涣散,导致党员队伍质量下降,很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健全和整顿党的组织的任务。针对基层党组织内部松懈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关于各种教育性质的会议,都“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②。针对许多党员对参加支部会议没有兴趣的问题,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具体的纠正办法:把支部会议“政治化与实际化”,会议“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对于议事日程,“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③。针对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④毛泽东提出的纠正方法,明确了党支部的职责和负责的具体工作,在当时事实上已经把党的小组和支部会议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基层党组织内部具有纪律性、约束性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二、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⑤尽管当时毛泽东已经通过实施“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有效地管理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红军“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⑥,他们主张“军队只管打仗”,扩大红军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也不积极做群众工作,不愿意和人民群众一起做艰苦的革命斗争,严重影响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难以有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针对红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毛泽东通过整肃军纪来提高部队执行力和战斗力。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为此,毛泽东郑重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⑦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以班排为单位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毛泽东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又提出了“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⑧六项注意,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队在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是会出现违反纪律、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情况。为了彻底纠正这些现象,同年4月,毛泽东把三项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把六项注意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和“不打人不骂人”改为“借东西要还”和“损坏东西要赔”,在对其内容进行调整和充实后,形成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颁布施行,还特别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①蒋伯英:《邓子恢闽西文稿 1916—1956》,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5、136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1 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2 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91 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9 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9 页。

⑦《毛泽东年谱(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22 页。

⑧《毛泽东年谱(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30 页。

国”的总任务。为完成这项历史伟业,毛泽东要求全军战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①。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制定的纪律准则,且“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②。考虑到各野战军在联合作战时需要有统一的纪律以规范部队的行动,同时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纪律化建设,毛泽东在综合各地各部门的经验和建议后,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做了修改。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指出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训令》还要求各地各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③。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训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统一的纪律规范。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产生过程及其内容演变可以看出,其所规定的纪律要求,看似是一些“小事情”,但就是这些“小事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不解决上门板、捆铺草这些“小事情”,就不能扩大红军的影响,增强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也就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军民鱼水之情;不解决长官打骂士兵问题,就不能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不解决虐待俘虏这样的具体问题,就无法使被俘虏的敌军士兵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所有这些“小事情”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可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不可能建成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指出:“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④总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对旧式军队进行根本改造的纪律守则,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强化纪律建设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三、将“四个服从”作为实现党团结统一的“最重要的纪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四项最重要的纪律”^⑤,并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⑥。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的纪律,有其现实针对性,既保障了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同时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曾多次发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的事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在党内搞家长制,听不进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集中党内的正确意见,也难以制止错误路线的推行。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擅自率部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在武汉另搞一套,对抗中央,拒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甚至不经请示便以中央的名义擅自发表宣言。陈独秀、张国焘、王明这种无视党的纪律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所在。实现党的团结统一,不但要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靠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的信仰和忠诚,还要靠严格的纪律来保证。如果一个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页。

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政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允许它的各级组织各自为政,允许党内成员各行其事,那么就不会有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就会失去战斗力,革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基于历史的深刻教训和现实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在今后,必须实行“四个服从”的纪律,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组织建设文件,分别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组织纪律,对全党坚持“四个服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克服各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建立报告制度,加强中央对基层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从而克服基层党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过去,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及其武装力量长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分割之中,各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和部队领导机关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在敌人重重包围的艰苦环境中通过这种“自治权”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队伍。但是,这种“自治权”也使党内一部分同志出现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良倾向,他们“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②。1947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根本性转变,这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无纪律状态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客观形势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③,用最大的努力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并“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④。毛泽东通过在党内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以“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⑤。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毛泽东认为:“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⑥因此,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各中央局书记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⑦。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常规性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⑧。

请示报告制度制定后,毛泽东还通过一系列文件对其进行完善,并在党内军队内采取有力措施来强化该制度的执行。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拓展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广度和深度,他要求中央局、分局、前委把对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各基层组织“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当地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⑨,以便中央充分掌握基层有关情况。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灵活运用各种通信方法、会谈方法和巡视方法,以及通信社和报纸,随时向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

⑤《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2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1266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中央请示和报告,密切联系,不要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针对军队中部分同志“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①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要求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把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作为一项“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来落实。毛泽东明确规定了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先向中央请示并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普遍地建立起来了。

党委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通过三湾改编,要求红军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委制一度中断。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军政委员会实际上行使了党委集体领导的职能。党的七大以后,许多同志建议恢复各级党的委员会。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和党长期所处的地下状况,无论在军队还是地方都没有条件经常集中更多的人和时间去开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这就导致部分领导机关个人包办、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现象频发,他们遇到“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②,党委会及党委委员形同虚设。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同程度遭到破坏,严重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要求健全党委制,改进党委会工作方法,增强全党纪律性,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就显得极为重要。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对健全党委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③。根据会议精神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就党委制建设和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

毛泽东首先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④他指出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对关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生活的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⑤。对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必须在开会前进行个人商谈,“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使委员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党委班子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尊重少数。党委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即使有问题也都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要在背后议论。只有这样,党委成员之间才能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避免一些错误的决定。毛泽东也强调,“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一方面,“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另一方面,要“划清两种界限”,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逾越。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在党委会的领导工作方法上,毛泽东要求“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⑥。对不懂得和不了解的工作,要向下级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而不是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在改进党委工作作风方面,既要“精兵简政”,也要“力戒骄傲”。

实践证明,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使得中央和地方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在重大军事战略与军事行动上能够始终保持一致,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也都能充分协调与相互配合起来,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也都有明显提高,基本克服了党内、军队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为党领导人民取得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通过纪律教育,使铁的纪律逐渐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循

党的纪律要能得到有效执行,除了党的纪律本身的强制力外,还必须依靠党员的自觉遵守。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①毛泽东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通过纪律教育,提高党员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增强他们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自觉性。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上一些破坏党的纪律的教训时深刻指出:“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②因此,为使广大党员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如何遵守党的纪律,以避免再发生类似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除了重申党的“四个服从”纪律,还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③。1946年7月,在解放战争开始之时,毛泽东根据人民军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指示各部队首长,要求“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④。在全国革命胜利来临之际,毛泽东更加重视全党的纪律教育。1948年1月,针对在高家堡发生的没收商人资本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要求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作出批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以使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阐述,从理论高度提高对加强党的纪律重要性的认识。

毛泽东还把党性教育作为纪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尽管毛泽东还没有提出党性这一概念,但是已经系统地阐明了党性教育的内容、要求和途径。毛泽东强调要通过多种方式和载体“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⑤,纠正红军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少数不服从多数的错误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以加强党员的集体观念和纪律自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党性教育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违反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1941年3月,中共中央就如何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开展了专题讨论,毛泽东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⑥同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通过党性教育,“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⑦,以达到统一全党的意志、行动和纪律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和总任务的转变,毛泽东把党性教育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来抓,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不仅锤炼了党性,也培育并强化了党员自身的纪律意识。

毛泽东还通过典型事例,对全党进行纪律教育,增强党员纪律观念。1937年,针对关于黄克功案件的不同声音,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严肃指出,要“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⑧。毛泽东认为,黄克功的行为既破坏了党的纪律又严重违反了法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⑨。毛泽东还要求雷经天在公审会上除了宣布法庭判决外,还要宣读这封信,提高人们对遵守纪律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及“锦州苹果”的故事,并用之教育全党要加强纪律性。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⑥《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87—28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总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正是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进行这种持续不断的纪律教育,才使我们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序、战斗力统一的整体。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 就要靠严明纪律。”^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基层党组织纪律建设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落实基层党组织在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方面肩负的重要责任,“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③,推动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严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严明的纪律和纪律教育,使党的纪律成为大家的自觉遵循,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LI Youxin & HUO Jie

(Centre for Studi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formed a set of systematic theories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at is, unifying the standards of Party members and providing basic guarantees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proposing the “Three Disciplines and Eight Points for Atten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taking the “Four Obedienc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discipline to achieve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Party, establishing a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within the Party to overcome various undisciplined and anarchic states, and conducting disciplinary education for all Party members, especially Party cadres, to gradually transform strict discipline into conscious adherence by Party members.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research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i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oughts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唐尧)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5日。